

西汉初中期 文艺思想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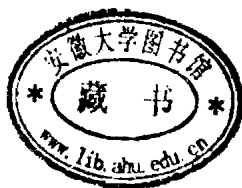
包兆会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西汉初中期 文艺思想研究

包兆会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汉初中期文艺思想研究 / 包兆会著.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7-305-11164-8
I. ①西… II. ①包… III. ①文艺思想—研究—中国—
西汉时代 IV. ①J209.3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6269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西汉初中期文艺思想研究
作 者 包兆会
责任编辑 朱湘铭 沈卫娟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玉河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11.875 字数 272 千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1164-8
定 价 28.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83686452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李春青

兆会博士的著作《西汉初中期文艺思想研究》就要出版了，因为这部著作也是他参与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的重大项目的部分成果，因此他希望我来写个序，尽管我一向不善此道，但盛情难却，也只好勉强写几句。

我每读《史记》、《汉书》，总会有一种特殊的感觉，觉得西汉的中国人与宋朝以后的中国人似乎完全不是同一族类。刘彻那样雄才大略加文采风流的帝王，卫青、霍去病那样气吞万里如虎的后生少年，朱家、郭解那样重然诺、轻生死的豪侠以及董仲舒那样学究天人的士大夫，司马相如那样铺张扬厉的辞赋大家，在后世似乎都难觅踪迹。当年到新疆游历，望着绵亘无垠的大戈壁，凭吊龟兹、楼兰、高昌等古国的遗迹，耳边似乎听到汉家军队的号角与马鸣；而到西安，徘徊于茂陵杂草丛生的巨大圆丘之下，则似乎感到发于远古的苍凉雄豪之气扑面而来……

盖就文化史演变言之，西汉去先秦未远，春秋贵族精神之余韵，战国游士之遗风均斑斑可考；再加上大一统之强大政治架构的确立，遂孕育出一种雄浑阔大之精神气象，此一精神不独见诸行事，亦且表征为言说、书写、雕塑、陵墓等一切文化符号。那种百家争鸣时

代的自由精神,与中央集权的整体规训之间的碰撞也能够产生出一种强有力的声音。有人尝言,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必呈现于一个时代的一切文化形式之中,殆非谬言。

学界有一种倾向,评论事物往往喜欢概而言之、大而化之,致使许多“成说”、“定见”经不起推敲。例如人们常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乎天下就一归于儒了。然则考诸史籍,则此说不确。翻翻桓宽所编《盐铁论》就可发现,即使是到了宣帝、元帝之时,距武帝立五经博士已经过了半个世纪之久,儒学究竟是否有利于治理国家,也还是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连许多士大夫都对儒学持怀疑态度。可以说,终西汉之世,儒学都未能真正落实为人们的日常伦理准则,只是到了东汉中期以后,经过长期浸润以及数代帝王与士大夫阶层的共同努力,儒学才真正为社会大众所接受,从而成为为人们信守的“名教”。

说到汉代文学,人们首先就会想到辞赋。就形式而言,汉代辞赋是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相碰撞、融汇的产物;就其文化蕴涵而言,则辞赋又是士大夫阶层与君权集团紧张关系之话语表征。从士大夫一面看,他们既想得到君主的重用,参与国家政治决策,又想保持自己思想与言说的独立性,并且对君权有所制约;从君权一面看,他们既想利用士大夫来巩固政权,为汉王朝之合法性提供证据,又对士大夫的自由思想有所顾忌,不允许他们像先秦游士那样任意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就造成一种既彼此合作,又相互提防的紧张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士大夫处于被动的劣势地位,现实境遇与他们的宏伟志向之间存在巨大反差,因此经常会有“有志不获骋”的感觉。那些“润色鸿业”、“劝百讽一”以及感叹“士不遇”的辞赋刚好体现着这种紧张关系以及在这一关系中士大夫的劣势地位。在文论上,司马迁“发愤著书”之说,也是这种紧张关系的反映。

兆会博士多年前曾就读于北师大文艺学专业,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位勤于思考且善于思考,在治学上颇为自信,甚至近于执拗的青年学人。后来他到了南京大学,学业不断精进。近年来我们在学术上常有合作。兆会为人言出必行,重然诺,颇有汉人风范。每次答应的事情,必然依约完成,绝不敷衍拖延。他多年来致力于汉代文化史、学术史、文学思想史的研读,功力深厚,创获颇多。这可从这部专著中看出。

不是简单地梳理、排列文艺思想观点,而是自觉运用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注重从文化史、学术思想史、主体心态角度对文艺思想史进行考察,是该书一个突出特色。例如该书对《淮南子》的宇宙论思想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感应论思想之于文学思想之影响的论述就很有见地,把属于宇宙论范畴的感应论与文艺思想中对于“情”的重视联系起来,使对汉初文艺思想的理解更深入了一层。另外,作者对经学语境中的文艺思想的分析,例如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对文论的影响,也颇能发前人所未发,给人以很大启发。

兆会博士年富力强,于中学、西学多所涉猎,知识结构合理,基础扎实,更难得的是他心无旁骛,专心致力于学海泛舟。可谓其志也远大,其行也谨细,假以时日,必有大成!

是为序。

2012年6月20日于北京京师园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西汉初中期文艺思想概况	1
第一节 汉初文学对先秦文学的承传	1
第二节 西汉初中期辞赋的文学思想	15
第三节 西汉初中期诗歌的文学思想	27
第四节 西汉初中期散文的文学成就	38
第五节 西汉初中期艺术的表现及其社会文化内涵	55
第六节 西汉初中期文论总体发展概况	65
第二章 西汉初中期道家文艺思想的表现	76
第一节 先秦道家思想及其在汉初的演变	76
第二节 先秦西汉道家生命意识与汉代文论的“养气”说	90
第三节 贾谊、刘安、司马迁的道家文艺思想	94
第四节 《淮南子》的新道家文艺思想	97
第五节 西汉初中期文学作品中的道家思想	110

第三章 西汉初中期儒家文艺思想的表现	120
第一节 西汉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	120
第二节 经地位的确立	136
第三节 经学语境中的文论思想	147
第四节 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及其对汉代文论的影响	156
第五节 《乐记》的文艺思想	173
第六节 《毛诗序》的文艺思想	180
第七节 西汉初中期文学作品中的儒家思想	188
第八节 西汉初中期儒家文艺思想与先秦儒家文艺思想比较	195
第四章 西汉初中期文艺思想与士人主体的关系	200
第一节 西汉初中期的政治文化结构与文学、学术中心	200
第二节 政治结构中的士大夫群体与士人文学精神的形成	212
第三节 西汉初中期士人文化心态对汉代文论的影响	218
第五章 从学术思想取向及士人境遇看汉人对《楚辞》的接受	229
第一节 贾谊、刘安、司马迁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	230
第二节 扬雄、班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	232
第三节 王逸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	235
第四节 对屈原及其作品评价的得与失	237
第六章 《诗》在汉代的经典化及其权力运作	241
第一节 《诗》经典化的物质基础:《诗》文字文本的形成	243
第二节 《诗》经典化的文化基础:《诗》作为一种礼乐文化的表	

意实践	253
第三节 权力参与下的文化生产行为等级秩序	263
第四节 《诗》经典化的权力保证：以对文化资本的控制为例	283
第五节 对《诗》的经典化及其权力运作的反思	293
第七章 《诗经》的传播及阐释：齐、鲁、韩三家《诗》学研究	308
第一节 三家《诗》特点	309
第二节 三家《诗》的退出与《毛诗》的流行	314
第八章 论汉赋、汉画像艺术成“像”方式的相似性	317
第一节 “像”的构成类型	320
第二节 “像”的造型风格	325
第三节 “像”的展开方式	329
第四节 成“像”方式背后的时代精神	333
第九章 《山海经》与汉画像中的西王母形象变异	337
第一节 作为部落神和宇宙神的西王母形象	339
第二节 西王母形象视觉表现模式的变异	345
第三节 变异背后的时代动力	351
参考文献	354
后 记	363

第一章 西汉初中期文艺思想概况

第一节 汉初文学对先秦文学的承传

一、楚文化对汉初文学的影响

1. 汉初文化对楚文化的吸收与借鉴

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统一的封建帝国。就政治而言,秦朝的很多开创性举措对后世影响深远,为汉朝所不及。但就文化而言,汉代文化是先秦文化的大融合,其成就与影响则非秦朝可比。在先秦文化中,楚文化对汉文化的影响十分深远。著名学者李泽厚曾宣称“汉文化就是楚文化,楚汉不可分”^①。李长之先生也认为:“汉的文化并不接自周、秦,而是接自楚,还有齐。原来就政治上说,打倒暴秦的是汉;但就文化上说,得到胜利的乃是楚……就精神上看,楚实在是直接继续秦而统治着的,汉不过是一个执行上的傀儡而已。”^②应该说,汉代毕竟是中华文化形成与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汉文化并非是先秦某种文化的翻版,而是深深打上了汉代

① 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5页。

②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3页。

自身烙印的文化。但不可否认的是,汉文化对先秦文化,尤其是楚文化的吸收与借鉴也是十分明显的。特别是汉初,楚文化的影响巨大。

《史记·项羽本纪》云:“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个著名成语历代解释甚多,其关键在对“三户”的解释:有解释为三户人家,有解释为楚三大王族大姓,也有将其视为地名者。^①一般的解释是:楚国即使剩下三户人家,灭亡秦国的必然是楚国。我们看《战国策》可以知道,战国中后期唯一可以与秦国争天下的诸侯国即是楚国。正因楚长期是“天下之强国”,是能亡秦的唯一诸侯国,因而楚国的强国形象深入人心,楚人之自信也由此而来。楚国即使只剩下三户人家,依然具备颠覆秦国的实力,这当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秦朝确实是被三个楚人——陈胜、项羽、刘邦所灭。三人中,项氏家族世代为楚将,项羽是正宗的楚人,陈胜与刘邦则不能称为正宗的楚人。他们之所以被视为楚人是因为生长于楚地。陈胜为阳城人,刘邦为沛县人。阳城与沛县在战国时期都是楚国的领地,因而二人对楚文化从小耳濡目染,极为熟悉。《史记·陈涉世家》记载:“其故人尝与庸耕者闻之,之陈……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楚人谓多为夥,故天下传之,夥涉为王,由陈涉始。”与陈胜从小庸耕的伙伴说的楚语,则陈胜说的大概也是楚语。陈胜起事时诈为楚名将项燕,自立为王时号“张楚”,将其视为楚人并不为过。刘邦身上的楚文化因素更多,下文将有论述。正因如此,李长之先生认为汉的胜利实际上是楚文化的胜利,是有一定道理的。

① 见《史记·项羽本纪》集解、索引,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01页。

汉初统治阶层对楚文化的偏爱自高祖刘邦开始。刘邦对楚文化的偏爱主要体现在对楚地音乐、舞蹈、语言、服饰及楚歌的喜爱上。《汉书·礼乐志》云：“高祖乐楚声。”《史记·留侯世家》也记载：“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从这两段记载来看，刘邦对楚地音乐与歌舞之偏爱可见一斑。因此，项羽被围垓下，刘邦能轻易地通过“四面楚歌”来瓦解西楚军队的斗志。刘邦对楚地服饰的喜爱，从叔孙通改变其服饰来迎合他可以证明。《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记载：“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而高祖对楚地语言的提倡，则与陈胜相同，都因其生长于楚地的缘故。《史记·高祖本纪》集解引《风俗通义》云：“沛人语初发声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后以为常。”而汉高祖对楚文化的偏爱最突出的表现是其对楚歌的创作与提倡。汉高祖十二年，刘邦衣锦还乡，作《大风歌》，是典型的楚歌。刘勰对刘邦之楚歌赞赏有加，其《文心雕龙·时序》云：“然大风鸿鹄之歌，亦天纵之英作也。”其后，汉代皇帝多有创作楚歌者，如武帝有《瓠子歌》、《秋风辞》等。正因汉高祖及汉初功臣集团中众多人均来自楚地^①，因而楚文化也随着汉朝的建立逐渐流行开来，甚至“连汉初推行的‘黄老无为之治’，也是楚地固有的思想传统”^②。

2. 楚文化对汉初文学的影响

由于汉初皇帝及功臣集团与楚文化关系密切，加之汉初上层贵族对楚文化的喜爱与提倡，楚文化对汉初文学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① 汉初功臣集团中萧何、曹参、韩信、周勃、陈平等皆来自楚地。

② 叶志衡：《楚风北袭与北学南渐——简论两汉文风的消长轨迹》，《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

(1) 楚辞对汉赋的影响

汉代文学最有代表性的文体是赋,楚文化对汉代文学最大的影响就体现在汉赋上。赋这一文体并非汉人首创,而是源自先秦。班固《汉书·艺文志》云: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衰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

班固将赋分为两种:一是赋诗言志之赋,一是贤人失志之赋。这两种赋均是秉承先秦文学传统而来,由此可见,汉赋秉承的是先秦文学传统。从班固后一类赋来看,汉赋与楚文化关系尤为密切。所谓“贤人失志之赋”,班固最先举的例子是荀子与屈原之赋。屈原是楚国贵族,荀子也长期居住在楚国并曾为楚官吏,二人与楚渊源深厚,而宋玉、唐勒都是楚辞的主要作者。由此可见,汉赋与楚辞存在直接的血缘关系。这一点,刘勰说得很清楚,其在《文心雕龙·时序》中云:“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馀影,于是乎在。”在刘勰看来,西汉辞赋虽经历百年的变迁,但大体上仍然是祖述楚辞,受到屈原的影响。《宋书·谢灵运传》也云:“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可见,汉赋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一脉相传的产物。王夫之

《楚辞通释》论《九辩》云：“其词激宕淋漓，异于风雅，盖楚声也。后世赋体之兴，皆祖于此。”显然也认为楚辞是汉赋之祖。因此，李泽厚直接指出，楚辞“是汉代赋体文学的祖宗”^①。

楚辞对汉赋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形式上看，汉赋直接脱胎于楚辞。马积高《赋史》将赋分为骚体赋、文赋、诗体赋三种，并认为骚体赋由楚歌、楚辞演变而来；文赋由诸子问答体和游士的说辞演变而来，相传为屈原作的《卜居》、《渔父》及宋玉的《风赋》也属此类。^②在汉初，汉赋的主要形式是骚体赋。骚体赋直接继承了《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在语言形式上的特点，即采用参差中见整饬、韵散结合的句式来表达感情。尤其“兮”字的运用，骚体赋更是直接受到楚辞的影响。在意象的运用上，不仅《离骚》中的“香草美人”意象在汉赋中大量出现，“远游”、“隐士”甚至“四方险恶”的意象都在汉赋中反复出现。从内容上说，汉初赋体作家往往借用“屈原忠而被谤”的故事进行言说，以此表达作家对自己怀才不遇的感叹，最典型的例子是贾谊的《吊屈原赋》。不仅如此，汉初赋家甚至模拟楚辞的某一部作品来作赋。清人刘熙载《艺概·赋概》云：“长卿《大人赋》出于《远游》，《长门赋》出于《山鬼》。”不仅司马相如，其他很多赋家均有模拟楚辞之作。如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是模仿《招魂》、《大招》所作，东方朔的《七谏》则是模仿屈原《九章》等等。班固《汉书·艺文志》列汉赋四类，其中屈原赋之类有“赋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数量为四类中最多，可见以屈原赋为代表的楚辞对汉赋影响之大。

（2）楚文学对汉初诗歌的影响

汉赋是直接受楚辞影响而产生的文体类型。但楚辞与汉赋毕

① 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5页。

② 马积高：《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6页。

竟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前者是诗歌,而后者是“押韵的散文”^①。在汉初,受楚文化影响而与楚辞同为诗歌文体的文学样式是楚歌。楚歌起源于楚地的民歌,屈原的《九歌》等作品中就有很多楚地民歌的影子。汉初,由于上层贵族很多与楚地关系密切,因而楚歌广泛流行。在刘邦之前,西楚霸王项羽在兵败垓下之时就曾作楚歌《垓下歌》。其辞云:“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全诗运用楚语,充分表达了项羽面临绝境时的无奈,充满了英雄末路的感叹。其与刘邦的《大风歌》虽基调相反,但都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汉兴,由于刘邦对楚歌的喜爱与提倡,汉初帝王大多对楚歌十分喜爱并有创作。刘邦《大风歌》之后,汉武帝的《秋风辞》也被后人认为是帝王文学的佳作。其辞云:“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王世贞《艺苑卮言》云:“汉武故是词人。《秋风》一章,几于《九歌》矣。”实际上,此诗对秋天景物的描写更近于宋玉的《九辩》,而其对“时不待我”的哀叹则近于屈原的《离骚》。除帝王外,汉初诸侯王也作有很多楚歌,如赵王刘友、梁王刘恢、淮南王刘安等等。^②此后,楚歌逐渐影响到一般文人,也成为汉代文人表达情感的一种文学样式。

楚文化对汉代诗歌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对楚歌诗的影响上,也体现在其对汉初祭祀乐章的影响上,如汉武帝时期的《郊祭歌》,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楚辞的影响,其中的《练时日》与楚辞关系更为密切。明代胡应麟《诗薮》认为其乃“骚辞也”,并称其“辞极古奥,意极

① 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

② 详见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82页。

幽深,错以流丽,大率祖述《九歌》”,明言其受到屈原《九歌》的影响。此外,《宋书·志第十一》载汉乐府《今有人》一诗云:“今有人,山之阿,被服薜荔带女萝。既含睇,又宜笑。子恋慕予善窈窕。乘赤豹,从文狸,辛夷车驾结桂旗。被石兰,带杜衡,折芳拔茝遗所思。处幽室,终不见天,路险艰,独后来。表独立,山之上,云何容容而在下。杳冥冥,羌昼晦,东风飘飘神灵雨。风瑟瑟,木搜搜,思念公子徒离忧。”虽全篇不见“兮”字,但无论具体的语句还是主旨,均是屈原《九歌·山鬼》的翻版。可见楚辞对汉乐府也有所影响。

(3) 屈原形象在汉初文学中的传播

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是楚文化的集中体现,楚文化在后世的传播也往往是以楚辞的接受为标志。在汉初,随着楚辞的传播,屈原形象在汉初文学中被反复书写,成为士人抒发情感的重要符号。屈原忠而被谤、怀才不遇的遭遇深深打动了很多汉朝士人,尤其是那些同样怀才不遇的人。汉初文人对屈原的接受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在作品中对屈原形象进行书写。最典型的作品有贾谊的《惜誓》、《吊屈原》和东方朔的《七谏》。《惜誓》以屈原的口吻写成,要表达的主题是“非重躯以虑难兮,惜伤身之无功”,对屈原誓死殉国深表痛惜。《吊屈原》是贾谊的名篇,表达的思想与《惜誓》相同,认为屈原不应死守楚国,应“自引而远去”、“远浊世而自藏”。这两篇文章虽然沿袭《离骚》建构的屈原忠贞形象,但对屈原不远走他乡而自沉汨罗江深表痛惜。东方朔《七谏》模仿《九章》,全部以屈原口吻写成,因而从内容到形式与屈原辞赋极为相似,对楚国与屈原的书写也基本一致。如《初放》“群众成朋兮,上浸以惑”,“巧佞在前兮,贤者灭息”,直言楚国小人结党营私、楚王受到迷惑,贤臣被排斥;《哀命》“伤楚国之多忧”,“何君臣之相失兮”,对楚国君王失去贤

臣，国家忧患重重表示痛惜。正因如此，《七谏》中的屈原形象与《离骚》一致，“正臣端其操行兮，反离谤而见攘”，仍然是忠而被谤的形象。与贾谊不同，东方朔还在文中为屈原不远走他乡而自沉汨罗江进行了解释。其《怨世》云：“宁为江海之泥涂兮，安能久见此浊世？”在书写屈原忠而被谤形象的同时，也表现了屈原的志行高洁。

其二，在作品中书写屈原形象的同时，汉初文人还为屈原及其作品立传，典型作品有刘安的《离骚传》和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就现有文献看，刘安的《离骚传》是第一篇专门研究屈原作品的文章。此文已佚，班固《离骚序》曾引用其部分文字。从其引文来看，刘安《离骚传》的重要观点是：“《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这一点，也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所引用。可见，刘安与司马迁一样，对屈原的《离骚》给予了高度评价。不仅如此，据班固所引内容来看，刘安还曾为《离骚》作注解，开了汉人为《楚辞》作注的先河。在现存文献中，司马迁是第一个为屈原立传的人。其《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对屈原生平记述甚详，并对其《离骚》、《渔父》、《怀沙》、《天问》、《招魂》、《哀郢》等文有所研究，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不仅“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成为后世论述屈原的基准，而且他以为“离骚者，犹离忧也”，认为“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一观点也成为解释《离骚》题名由来的经典阐释。刘安和司马迁之后，汉人继续注释《楚辞》特别是《离骚》，取得了很多成果，刘向和扬雄撰有《天问解》，班固、贾逵撰有《离骚经章句》，马融有《离骚注》，王逸更是著有楚辞学经典著作《楚辞章句》。

实际上，楚文化对汉代文学最大的影响不在具体文学样式上，而在对汉代文学浪漫精神的影响上。李泽厚以为，汉代文学艺术都有相同的艺术气质，不管是汉赋、汉乐府，还是汉画像石和汉代雕塑